

我的启蒙老师

石钟扬

一

白色墙上小摆钟，
嘀哒嘀哒响不停……

这当然不是我小学时代学的唯一或最好的儿歌，却印象最深。因为教这儿歌的国达老师是桐城人，他把“钟”念成“军”，“摆”念成“白”，读起来唱起来别有韵味。

国达老师是从宿松县复小下放到我们老岸小学教书，他与我由师生成了同事。我们还时而哼起那儿歌，话说当年趣事。朋友说，那儿歌恰是国达老师的人生写照。

二

1950年代的小学并不平静。1957年夏天某晨，霞光万道，早操过后，各班列队听教务主任吴森例行报告。他神采飞扬的报告却被两个“公安”打断，人被当场带走。在场师生目瞪口呆。事后听说吴主任是“右派”。小学二年级的我哪知何谓“右派”，更不知吴主任为何被打成“右派”。

吴老师走后，祝如春老师接任教务主任。他走路轻手轻脚，说话轻言细语伴以不停的鼻息声。他从不主持早操后的广场例会。有次他按食堂兑换标准用粮票找我换些山芋（我家离校有六华里路，从小学一年级就驮粮草到学校食堂搭伙用午餐），将粮票和钱交给我时，他那种神情活像个考试作弊的学生。临别他送我一本《少年文艺》，令我惊喜。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文艺杂志，从头到尾，我读了不知几遍，至今还记得其中有写登山女英雄潘多的故事。

受那本《少年文艺》的影响，我写了四句顺口溜应某景，被语文老师推荐发表在学校墙报上，招来不少同学的青眼与白眼，令我迷茫：什么叫羡慕嫉妒恨。

祝老师下放到隔壁的杨墩教书。1969年12月初，以我订婚为由，国达老师发起一场雅集（老岸、周墩两个大队十几个孩子王拿出当月五元钱的补贴，公办老师也随缘凑份子）。我们在周墩小学教室大闹天宫，酒酣之余，国达老师又出点子，每人现场作诗一首，不作不许离场。祝老师当即申明：不长此道。好玩，随便写几句吧。面对国达老师的劝说，祝老师脸红了，夺步要走。国达老师竟把住大门不让走。祝老师连连缩鼻子，脑袋几乎抵到国达老师的络腮胡子上：国达，国达，何必这样！我赶紧解围：国达老师，放行！

望着祝老师独自离去的身影，我陷入了

沉思：祝老师怎么可能连逢场作戏写几句打油都不会？应是前任吴森老师留下的阴影太深，何况正是非常时期，他怎敢轻留文字在人间？我理解祝老师，后来我们弄此类文玩，再也不敢惊动祝老师。

三

周甲生是我们三年级的语文老师，一表人才，他妹妹也在复兴小学教书，与央视一姐周涛一个模样。周老师普通话非常标准。我们从小讲宿松方言，学了普通话也多成“宿普”。周老师字正腔圆，读起课文，朗朗上口，令我们耳目一新。

1958年，全国大兴“除四害”之风。周老师独出心裁，自制纸扇为奖品。一张十六开的白纸，以淡墨略加点缀，即成一弯月牙或几株花草，再稍加折叠或剪裁，就成一把折扇或团扇。彼时的我们不知什么叫艺术，更不懂生活艺术化的原理，只觉得周老师手太巧，他自制纸扇太美。大家都愿为获得这精美奖品而去努力除“四害”（按：为麻雀平反是多少年后的事）。

那纸扇若保存至今，应是珍贵的文物了。可惜我较笨，除四害不力，没获得过那份奖品。我与周老师却另有故事。有次雨后上体育课，我在操场踩青苔滑倒，跌进一汪泥水中，裤子湿透了。虽是夏季，仍受不了。周老师知道后，拉我到他的房里，找出一条大红的三角裤，让我换上。我们乡下娃平日一律穿土布宽裤脚，从没穿过三角裤而且是大红的。虽不合身，连该遮的部件都遮不住，尊敬不如从命，我只得穿着，酷似小号卓别林，一路上不敢看别人的眼光，到家爸妈也哭笑不得，但没忘叮嘱好好感谢老师。

可是有一天，周老师从课堂上被“公安”带走了。复兴镇上无监狱，当时他被关在与复小一墙之隔的区公所。下课时我们涌向区公所，那里有人把门不让进。我们就趴在铁窗外，看望老师。老师那么英俊，那么镇定。他走到窗边，深情地看着我们，轻轻地说：同学们，上课去，都上课去。

上课铃无情地响起，我们含泪，默默地告别老师。

再次听到周老师信息，是二十年后的八十年代初。所谓反革命集团案是乡人告密酿成的冤案。周老师的哥哥当年就被枪毙，周老师由死缓而有期而平反而无罪释放，饱经沧桑。

周老师是宿松许岭人。关于他的晚景，我找那边的朋友多方打听，竟有两个版本。一说他被捕不久女儿才出生，周老师回家的头一天，已是大姑娘的女儿提出与爸睡一床，亲热亲热。一说他被捕时尚未婚配，平反释放被恢复公职，他立即办理退休，隐居乡间，与世隔绝。

四

史圣清老师是五六年级的班主任兼教语文。他家住小孤山脚下，年过五十。浩然有篇小说（似为《喜鹊登



雪乡 李昊天 摄

枝》)辞头一句“他是个年过半百的老人”，代表着那时对老人的认知。史老师爱抽黄烟，一根硕大的旱烟杆总不离手。偶尔在校外碰见他肩扛烟杆背点什么东西，真与乡间老农无异。

我从五年级就住校。学校就一间学生宿舍，能住十来个人，安置路远的同学。寄宿的同学都住一楼统铺，非常拥挤。史老师让我上二楼与他同住。说是二楼其实是个阁楼，从直立的木梯爬上，史老师个头高根本伸不直腰。一张双人床，我们师生一人睡一头，冬天史老师会紧紧地抱着我的双腿，怕我冻着，如同祖母平日那么护着我。我也抱着老师的腿入睡。那时我并不知道“同榻而卧、抵足而眠”的典故。

在阁楼睡觉最要命的是晚间起夜，只有个陶制尿壶放在房拐上。整个复兴当年没有电灯，煤油灯晚上要熄掉。有一夜，我摸黑起床，楼板不平翘翻了尿壶，尿水洒到楼下同学床上。他们大叫起来。史老师立即起床，用极有穿透力的低声说：对不起，是我不小心弄翻的，睡吧，明天晒晒。同学们真好，果然闷不作声。第二天学校竹排围墙上多了一道风景，各色被子都在那里晒着。

我真的对不起同学们，没有勇气去承认过错；真的对不起偏爱我的史老师，让您替我背黑锅。

五

复小，全称复兴中心小学，初創在复兴老街。1954年长江以洪荒之力将老街揽入江心，洪水退后老街成峭壁危岸。有司年年抛石护岸，企图阻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变迁，也只挽留住复兴区境内唯一的轮船码头。同马大堤内侧的新街应运而生。

纵横两条不宽的马路交叉成十字路口，向四方延伸一华里不等，即新街基本格局。十字架上的区公所、百货商店、银行、供销社是两层楼，其余几乎都是平房，这就是新街立体形象。

复小紧挨着区公所的西围墙（墙有一丈多高，有侧门通学校操场），约五六亩地皮，一分为二，北有两排前低后高的平房，是教学区；前边为操场，操场西半部有篮球架，东半部有单双杠，南北两排白杨护卫着操场，

临马路有一人高的竹片围栏，围栏中间有一敞口大门。靠围栏东端有砖垒的主席台，是早操指挥与升旗之处所。

复小是仅次于城关实验小学，为全县数一数二的重点小学，六年制，每年级两个班，在校学生近五百人（主体是复兴乡的学生），教师十几位。

复小是我启蒙之地，我在这里领略了人生哲学第一课。我1961年小学毕业后，就到百里之外的县城念中学去了。每逢假期回乡，我都不失时机地去亲近母校。在四周有青苔的操场上转转，在那同心圆的双拱门内走走，在似曾相识的教室边站站。我也会抚摸那似历史见证人的白杨树（洲地主体是杨柳，读了茅盾《白杨礼赞》，更知其为复兴之一大奇观）。只是特殊时期老师全部下放到各乡村，复小被空壳化，后又被商潮挤走，从新街迁到石坝。据说建得很美，但那里还有我们少年时代的痕迹吗？

不过，消失的母校岂只复小一家。我就读的宿松中学堪称变脸大王。不说易帜前走马灯式地迁校（考棚→估亩山→文庙→祝古桥→社坛铺→考棚），这几十年也折腾不止。我上初中时在考棚，上高中换到师范旧址，后其又回考棚，二十一世纪初校园被浙商夷为商城，被迁城北将军山南麓。旧貌固然换新颜，却难寻我辈青春气息。

当传与承或怀旧与发展成悖论，主事者应将老校区的标志物件，如考棚的碑刻、复小的拱门，复制在新校区，让新老学子之母校情结有个寄托物。

复小旧地虽荡然无存，好在国达老师数十年与我有着联系。1970年代初我招工离乡时，有俚句赠他：

没用鲜花，也没用美酒，
就是在平凡的日子里，
你自然而然成了
我的“老师加朋友”。

他更深情地鼓励着我：

春来了，
春就是新生。
我亲爱的伙伴——
你就是春。
今天你已萌发了
我期待着你的茂盛。

去年清明节，秀春学长陪我到山水公园边的一家公寓去看望了国达老师。老师年近九十，仍很健朗，仍如当初“我们促膝对坐的时候，你总是舒展着浓眉……你总是微笑着胡茬……”我带了本《钟情独秀》的画册给老师，算是迟交的作业。

秀春学长曾当过复小校长，知道更多国达老师的故事。在归途他说，张老师女人缘真好，夫人那么勤劳贤惠，夫人病逝后竟有人争着跟他……我耳际仿佛响起那“桐普”腔的儿歌：

白色墙上小摆钟，
嘀哒嘀哒响不停。

